

## 书评

###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 Me and Othe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 Chinese History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ISBN：978-710-80-3478-6

阮光安\*

(WAN Kong Ann)

“到了今天，经过八次锤炼，‘中国’已不再是传统的中国。‘中国’竟在几个古老文化体系之中，经历了最大，也可能最为彻底的变化过程。我们甚至可以提问：原来的‘中国’是否还存在？”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

“我是谁？”这个最简单也最深邃的问题或许正在困扰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展出去：“我们是谁？”，则可以变成令人困扰的族群认同问题。那么把视角和眼界再放大一些：“中国是什么？”似乎就更加纠结不清了。“中华”“华夏”“汉人”“唐人”“华人”“契丹Cathay”“支那Sina/Cina”……到底哪一个才是“中国”？整个世界不断在改变和重组，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共同体不可能一成不变。职是之故，“中国是什么？我们又是谁？”这是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合情合理的解答，就很难全面看清楚这个传统又现代的东方大国的真实面貌，也就无法真正体悟到这个宏伟又精致的美丽文明的精神本质。也恰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先生所言，几乎所有人都不曾质疑“中国”这个词的界定问题与历史脉络。因为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境在哪，中国就在那”，所以对书架上冠以“中国”的各种著作、媒体上使用“中国”的各种议题、生活中出现“中国”的各种字眼，都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Made in China”成了各国广大消费者熟悉得容易看走眼的标示，甚至是曾经一段时间在新媒体上泛滥的“是中国人就该怎样怎样”“是华人就要怎样怎样”的网络热议，许多人看了，感觉哪里不对，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明显地，不论是身处大陆，还是港台澳，还是东南亚，还是地球任何一处，任何人对“中国”的认识与认同，如果只是建立在粗浅的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大系统之上，这样的眼界和

---

\* 阮光安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wankongann@gmail.com

思考，必会在全球化的境地中显得狭隘而乏力。

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和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习以为常却并不寻常的观念，因为它联系着我们的身份认同与精神归属的严肃问题。把视界拉近，对许多正在寻找或者已经知道本身身份认同的马来西亚华人来说，重新思考何谓“中国”或许有些遥远和无济于事，但是，大马华人追寻和确认“中华性”，与中国人民解构与建构“中国性”，这两个看似一前一后的溯源动作，本质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当我们进一步确认和巩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华人之所以为华人”的原因、范畴和性质，个人的世界观，和集体的历史记忆，似乎就此有了依据。

许倬云先生2011年出版的《我者与他者》这本讨论历史与文化中外关系的小书或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些重要的参考与指标。2007年末，许倬云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和崇基学院联办、中大历史系协办的“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公开演讲上提出“中—外”关系模式和“自—他”互动形态的看法。许先生是这个重要讲座的第一届讲者，他不仅与余英时教授同龄，也是世界知名、著作等身的历史学者。两人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都在美国教学及研究多年，所以能够包容中西、兼治古今。由许先生来剖析“中国”这一复杂的系统与观念，思考过程和论述成果都有着指标性意义。

这本小书，便是许先生上述讲座的演讲稿修改润色而成。从史前时代到国共两党的中国，在许先生流畅的叙述下，以历史朝代时间为时间主轴，间中再横切入相关的概念讨论，结合中西古今学者的看法，感觉就像一场多向的论坛，这样的表达方式颇为独特，因为它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中国”的冷静视角。比如，谈过周代封建天下和战国列国体制，许先生先让读者抽身出来看一看“中国世界”的形成，再回到汉代的中國观，让我们对“汉之为汉”的特殊历史意义有了更实际的认识。在讨论唐代前，先探索帝国系统的衰败，以及“主”“客”转化和“他”“我”混合，读者就会更了解为什么唐朝可以如此璀璨丰富了。而许先生刻意在满清帝国和国共两党的中国之间加插一章讨论近代的变化，将外在影响（尤其是西方）接榫在近代中国的结构性变化中，就在这内外动力相互消长的状态下，中国又开始一个惊天动地的重组。“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浮沉了千百年，更替了那么多朝代那么多统治集团，就如“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那样，当整个“中国”在多次的历史淬炼之中经历了最大最彻底的变化，原来的“中国”是否还存在？当“中国”不再是传统的中国，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真正的中国？不能厘清“我者”的处境，如何面对“他者”的眼光？而“我者”与“他者”，长久以来都是不断在相互排斥和相互混合，区分界定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答案。许先生尝试爬梳纷杂的史料，从中勾勒出一个条理的架构，颇见功力。

要将纷繁冗杂的历史进程梳理出一条脉络，需要很大的功夫和心力。许先生善用了他驾轻就熟的社会学和考古学方法，清醒下判断，并且快刀斩乱麻，带领读者从中国历史看历史中国、从中国文化看文化中国、从中国政治看政治中国，读起来一气呵成、干脆利落，但其实背后却是举重若轻、力透纸背。比如在总结帝国系统的兴衰，许先生认为：“全国统一时，各处地方经济互通有无，一荣俱荣。中国分裂时，经济网络系统，既能一时退缩为区域性的自存，又时时渗透分裂政权之间的边界，稍济彼此之间的不足。尤其后者，由于趋向最大互利，常常在中国分裂时，发挥修补分

裂的功能，终于又可逐渐将分隔的市场网，再度整合为一，也赋予政治再度统一的契机。”（页49）简洁明了解释了除了皇权和精英思想以外，形而下的民间经济网络也“偶然”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分合兴衰，这让我们理解到区域市场网络与地方社会在一个整体国家中的关键作用。

许先生在书中也不断强调“主流”与“异端”之间的互动与磨合，目的或许就是否定长久以来我们所习惯的文化与民族的二元论和纯种说，将我们的思维提升到更开阔的境地，才能更全面和深入看待彼此的过去与现况。例如谈到战争，我们总会以为这成王败寇的动乱只是带来毁灭和破坏，但是许先生认为：“战争之中，敌对双方，也有彼此学习之处”（页54），并以霍去病学用匈奴骑兵战术反伐匈奴、曹操吸纳乌桓败兵组成“天下精骑”外籍兵团两个例证来说明战争中彼此涵化而主客转换的现象，一反我们对战争的成见，重新思考战乱的本质。纵观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确实有不少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正是借着毁灭性的战乱在异地重生，像是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东来，确实也和战乱关系密切而微妙。或许这也可以稍微解释了为何中国两千年来战火不断却也文明日盛的原因吧。

话说葛兆光先生当年写完《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几乎是已经精疲力尽”，但是内心却产生“一种急迫和焦虑”，于是再拿起如椽巨笔，写下《宅兹中国》一书，来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用情甚深。相信许先生和葛先生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为自我设限画地为牢而变得单调呆板，失去原有的生命力和精神力。是的，作为读者，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敞开心胸、接纳包容、不唯我独尊，才能享受因交错而融合、因融合而多元的历史和文化。狭隘的民族观应该摒弃了，斗胆说一句：战乱时期已过，动不动再以“大中华民族主义”来煽动读者的感情，不成熟也不明智，因为历史学者告诉我们：历史是“大家”一同创造的。所以，只有看清“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楚河汉界其实是族群和疆域这个想象共同体的投影而已，我们才能跳出坐井观天的局限。

但是要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这么一个宏大的观念，就不是寥寥数语可以交待得了的，所以这本书较为可惜的地方就是只能蜻蜓点水式地将整个大历史宏观地走马观花一遍，毕竟一本仅一百五十来页的小书，要细致讨论整个从史前到新中国的思想系统，是不太可能的。它只能说是一个引介。许先生只是将一个思考日久的问题公开提出，再尝试搭建一个答案的基本思路架构。所以，或许可以将此书当做进入许先生另一本著作《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2015）、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以及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013增订本）三本书的热身读物。《说中国》再次尝试分析“华夏”的内涵与外延，让我们看清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与演变；《宅兹中国》以历史、文化与政治三个向度来重新讨论和定位“中国”意识；《华夏边缘》则论证“边缘理论”在这块大陆上建构的“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这些细致的讨论，都可以在许先生的这本小书中看到痕迹和端倪。合上本书，深深感受到，许先生为读者另辟蹊径之余，也让我们得以更脚踏实地的态度来对待自我和他人的历史，在目前一片喧哗繁杂的声色光影中，似乎看到一条属于真正学者的冷静与踏实的学术之路。